

惯用语理解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王君明 陈永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00012)

0 引言

比喻(metaphor)在人类的语言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惯用语是比喻的一种,是短小精悍、约定俗成、运用广泛的固定词组,通过比喻意义来表达言外之意。理解言外之意的心理机制是心理语言学的一个研究课题,而且在儿童掌握母语、成人学习外语等活动中,惯用语的理解都很重要。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内有关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开始^[1],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本文介绍一下英语惯用语理解的心理研究成果,作为借鉴。

1 惯用语的心理表征

长期以来,在惯用语理解这个研究领域内,学者们热衷于研究惯用语的句法特征,很少关注惯用语的心理表征形式。原因有几方面。第一,传统的理论观点认为,惯用语是零散地分布在心理词典或“惯用语词单”中的,不存在系统的组织原则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储存起来。第二,人们认为绝大多数惯用语都是“死喻”(dead metaphor),即惯用语曾经有比喻来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了比喻的性质,现在只是普通的词组(Chomsky,1965)^[2]。

实际上,惯用语本身与其比喻意义之间并非想象中的简单一一对应,其背后有很值得探讨的根本原因。Gibbs等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开拓性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概念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概念性比喻(conceptual metaphor)和心理表象(mental imagery)。

1.1 概念知识

Gibbs提出,许多惯用语的使用和理解是由人们的概念知识驱动的,惯用语本身所包含的信息远比其比喻意义丰富多彩、具体形象。某个惯用语是否适合于某一语境不是主观现象,而是由惯用语与某一特定语境之间的概念联系决定的。因为不同的惯用语指向其所表达概念的不同特性或方面,因此只适宜于出现在某些语境中。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认知结构中有许多概念知识。概念知识是以最佳范例或原型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以原型为基础的概念具有某些特征,例如时间结构,即组成原型的事件按一定的时间顺序组织起来。举例来说,愤怒这种情绪概念由以下事件按时间顺序组成,依次为先导条件、行为反应和自控。对应于愤怒的这3个阶段,有不同的惯用语。先导条件指突然失去力量、地位或自尊,相应的惯用语有 eat the humble pie, kick in the teeth, swallow one's pride 等。行为反应指人在发怒时的外在反应,相应的惯用语有 get red in the face, get hot under the collar, blow the stack 等。自控指人努力保持镇静,相应的惯用语有 keep your cool, hold your temper 等。

Gibbs假设,人的认知结构中有关于情绪概念的时间顺序信息。如果被试在实验中判断惯用语的语境适宜性时运用了这种知识,就说明概念的时间结构特征是某些惯用语的心理表征的组织原则。实验结果表明:(1)被试认为相同阶段的惯用语的比喻意义相似程度高,不同阶段的惯用语的比喻意义相似程度低;(2)当惯用语在句子中的呈现顺序符合概念原型的时间阶段,那么,该句子获得的有意义评定等级较高;当惯用语在句子中的呈现顺序破坏了概念原型的时间阶段,那么,该句子获得的有意义评定等级较低;(3)被试能对指向同一概念原型同一时间阶段的惯用语做出更精细的语义区分;(4)惯用语与语境之间的概念整合可以提高对惯用语的阅读速度^[3]。

Gibbs认为,描述同一概念的惯用语具有相似的比喻意义,它们聚集在概念原型的周围,并按

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建构的篇章心理模型与惯用语的比喻意义进行概念性整合,这个整合过程决定了某些惯用语适合并经常出现在某些语境中,而不是另外的语境中。虽然Gibbs等在编制实验材料时选择的惯用语都是动宾结构的,而且都是关于情绪的,但是,他们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这种探索和努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2 概念比喻

惯用语本身与其比喻意义之间既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又存在很重要的差别。在长时记忆中存在一些概念性比喻,例如,MIND IS A CONTAINER(大脑是容器),ANGER IS HEATED FLUID IN A CONTAINER(愤怒是容器中被加热的液体)。惯用语 flip your lid 与其比喻意义 get very angry 就是通过这两个比喻联系起来的。这种联系是通过比喻映射(metaphorical mapping)过程实现的,即把源域(source domain)中的知识(如“容器中沸腾的液体”)比喻靶域(target domain)中的知识(如“愤怒”),以利于人们更具体形象地理解和概念靶域。这种比喻映射保留了源域的结构特点和认知形态。

Gibbs 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4]。被试的任务是阅读几个段落,然后就每个段落回答3个问题。例如,在读完“容器中的液体——想象你正注视一个圆柱体容器,容器的顶部是封闭的。容器里充满了某种液体。”后,绝大多数被试都回答,“液体被加热或在压力之下”,“液体的溢出是无目的的”,“液体溢出的方式是剧烈的和迅速的”。这说明被试能清楚地认识到源域知识的特点,能理解其原因、目的和方式。此外,被试在阅读包含惯用语的句子时进行的推论(靶域)与源域一致。例如,在读到 flip his lid 时,读者认为主人公生气是因为有某种内在压力,他的愤怒是无意识的,他表达愤怒的方式是迅速和剧烈的。而它的比喻意义不受概念性比喻的驱动,所以,惯用语的比喻意义不能激活源域知识并做出相应推理。

惯用语与其比喻意义之间的差别还表现在,它们与语境的整合对它们的理解过程有不同的影响。对惯用语而言,故事情节中主人公的行为的原因、目的和方式如果与惯用语背后的概念性比喻一致,则该惯用语被认为适合该语境,如果不一致,则该惯用语被认为不适合该语境。对惯用语的比喻意义而言,无论概念整合的程度如何,对其语境适宜性都没有显著影响。阅读时间实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在不破坏这种关系的语境中惯用语的阅读时间短于破坏这种关系的阅读时间,而比喻意义在各种条件下的阅读时间没有显著差异。

惯用语并不简单等同于其比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概念性比喻驱动的,隐含着丰富、具体和复杂的意义。不过,Gibbs 的实验多采用断线(off-line)方法,他本人也承认,已经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的成年读者理解惯用语的过程高度自动化,相应的概念比喻可能得不到激活,而且人们在正常阅读过程中是否对惯用语所有的复杂意义进行推理还不清楚,需要在线(on-line)研究来验证。

1.3 心理表象

语言学家关心惯用语的历史根源,而心理语言学家注重分析人的认知结构中关于惯用语的比喻基础的内隐知识,其中一条途径就是详细分析人们对惯用语形成的心理表象。例如,下面的问题是关于 spill the beans(洒蚕豆,比喻为无意中泄漏秘密)的心理表象的:蚕豆在洒出去之前在哪里?容器有多大?洒蚕豆的行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蚕豆洒出去后在哪里?洒出去的蚕豆形成完整的一堆吗?蚕豆洒出去后容易恢复原状吗?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惊人地相似,人们通常的回答是:容器的大小与人脑差不多,蚕豆应该在容器里,洒蚕豆的行为是无意的,蚕豆洒出去后不大可能形成一个堆,而且很难恢复原状。

Gibbs 等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具有相似比喻意义的惯用语,人们形成的心理表象高度相似,而且对这些表象的知识高度一致。在实验中,呈现一个惯用语,要求被试下定义,并形成一

理表象。然后要求被试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心理表象,最后就这个心理表象回答一系列问题。实验结构表明,平均有75%的心理表象是一致的,而且对问题的回答高度一致。例如,blow your stack的心理表象是一个人的脑袋因为内部压力而爆炸,并且同时有蒸汽从头顶冒出。在另一个实验中,被试的任务是形成惯用语的比喻意义(如 get very angry, reveal a secret)的心理表象,并回答有关问题。结果,平均有34%的表象一致,显著低于上述实验,而且回答问题的一致性也显著低于上述实验。直义短语(literal phrase,如 spill the peas)的结果类似于比喻意义的结果,表象一致性的比例平均为30%,回答问题的一致性程度较低^[5]。

2 惯用语的句法和语义

在英语中,有些惯用语进行句法转换以后仍然能保持原来的比喻意义,而有些惯用语进行句法转换以后丧失了原来的比喻意义。

惯用语的句法灵活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可以对句法灵活的惯用语的某些成份进行语法修饰,例如在 leave no stone unturned(想尽办法)中的 stone 前加上 legal 变成 leave no legal stone unturned(想尽各种合法的办法),比喻意义不受损害;(2)某些成份可以数量化,例如,pull string(走后门)可以把 string 数量化,变成 pull a string or two(找些关系),比喻意义不受损害;(3)通过主题化(topicalization)来强调惯用语中的某一部分,例如,在 Those strings he wouldn't pull for you(他是不会为你托人找关系的)这个句子中,pull string 中的 string 被移至句首并变成复数,比喻意义不变;(4)被动语态转换,例如,lay down the law 变成被动语态后(The law was laid down by John),仍具有比喻意义“发号施令”;(5)时态转换,例如 let off steam 的现在时态 Mary was just letting off some steam;(6)小品词移位,例如,let off steam 中的 off 可以后移,Mary let some steam off.

惯用语的句法和语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句法特征效应”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惯用语的内部语义关系。惯用语的内部语义关系指惯用语的各个语义成分与其整体比喻意义之间的关系。惯用语的语义可分析性(semantic analyzability)或可分解性(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是由 Nunberg (1978)^[6]提出的。如果各个语义成分独立地对整体意义做出了贡献,那么该惯用语在语义上是可分的。例如,在 spill the beans 中,spill 指泄漏秘密的动作,beans 指想法或秘密,所以,spill the beans 在语义上是可分的。

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Gibbs 认为,惯用语的句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话者对惯用语的组成部分对整体比喻意义的贡献方式的直觉决定的。如果惯用语的各个语义成分对其整体比喻意义做出贡献,则它的句法灵活性或产生性的程度高于语义不可分的惯用语^[7]。

实验依据如下:(1)被试能区分语义正常可分(normally decomposable)、语义非正常可分(abnormally decomposable)和语义不可分(semantically nondecomposable)的惯用语;(2)被试认为语义正常可分的惯用语比语义非正常可分和语义不可分的惯用语的句法灵活性高;(3)在省略名词(pronominalized construction)的情况下(例如 I button my lips, but Steve didn't button his.),语义正常可分的惯用语比语义非正常可分和语义不可分的惯用语更好地保持了比喻意义;(4)透明度高的惯用语(即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联系紧密的惯用语,如 skate on thin ice)比模糊的惯用语(即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联系不紧密的惯用语,如 chew the fat)的句法灵活性高。

Gibbs 等发现,语义可分的惯用语的加工速度快于语义不可分的惯用语。由此推断,被试在读到惯用语时要进行组成成份分析(compositional analysis)。因为语义可分惯用语的语义成份对整体比喻意义做出了贡献,所以其意义较快地得到激活。此外还发现,以前的研究发现句法凝固的惯

用语加工速度较快是因为这些惯用语在语义上是可分的^[8]。所以,惯用语的句法特性最终是由其内部语义关系决定的。

词汇灵活性(lexical flexibility)是惯用语句法的另一方面。有些惯用语的个别词可以替换,其比喻意义不受影响,例如,hit the hay 变成 hit the sack 后的意思仍然是“上床睡觉”,eat one's words 变成 swallow one's words 后的意思仍然是“食言”;而 kick the bucket(死)变成 kick the pail(踢桶)后的比喻意义就被破坏了。实验结果表明,语义可分的惯用语中的动词或名词被它们的同义词替换以后,惯用语的比喻意义基本没有改变,而语义不可分的惯用语进行同义词替换以后,其比喻意义被破坏了^[9]。对语义可分的惯用语而言,因为替换后的词基本保持了原来各成份与整体比喻意义之间的关系,所以比喻意义没有被破坏。

3 惯用语的意义激活

惯用语与一般词组最大的区别是,惯用语既有字面意义,又有比喻意义。例如,spill the beans 的字面意义是“洒蚕豆”,它的比喻意义是“无意中泄漏秘密”。对惯用语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字面意义优先模型、平行加工模型、比喻意义优先模型和交互作用模型。

字面意义优先模型强调惯用语的字面意义在其理解中的重要作用。该模型认为,读者先构造惯用语的字面意义,如果这个意义与语境不符,再启动惯用语加工方式,从惯用语词单中提取比喻意义(Bobrow & Bell, 1973)^[10]。平行加工模型认为,惯用语在心理词典中的储存和提取方式与长单词一样。在遇到惯用语的第一个单词时,同时开始计算它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即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11]。比喻意义优先模型认为,可以绕过惯用语的字面意义,直接提取它的比喻意义^[12]。

惯用语两种意义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歧义词的多种意义竞争。多数研究的结果支持惯用语的比喻意义激活较快,这可能是由意义的频率效应造成的。因为惯用语的比喻意义使用频率高,字面意义较少使用(例如 kick the bucket 经常被理解为“死”而不是“踢桶”),所以比喻意义的提取速度较快。此外,支持以下观点的实验采用的方法都是断线的,很难说明正常阅读过程中惯用语意义激活的时间历程。

相互作用模型认为惯用语的意义激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喻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它们的激活过程受惯用语本身的特点、语境等因素的影响。

Cacciari 和 Tabossi(1988)采用跨通道启动(cross-modal priming)方法来研究惯用语理解的即时加工过程。基本做法是,听觉呈现一个包含惯用语的中性句子,被试的任务是对视觉呈现的靶词进行词汇判断。以 in the seventh heaven 为例,靶词分为三种,一种是与比喻意义相关的,如 happy(高兴的),一种是与词组尾字 heaven(天堂)的字面意义相关的词,如 saint(神圣的),第三种是无关控制词,如 green。在惯用语是可预测的条件下,被试对喻义相关靶词(happy)的判断速度快于字义相关靶词(saint)的判断速度。如果直到最后一个词才能判断这个词组是惯用语时,则被试对与字义相关靶词(saint)的反应速度较快。如果在惯用语呈现 300ms 后再呈现靶词,那么对喻义相关靶词和字义相关靶词的判断时间差异不显著,而且都快于对控制词组的反应时间^[13]。以上结果说明,惯用语比喻意义的激活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是一个较慢的过程。在比喻意义没有激活之前,惯用语的字面意义被激活,尾词字面意义的激活能保持到惯用语呈现 300ms 以后。Cacciari 等进而提出惯用语键(idiomatic key)这个概念,认为惯用语的意义是与组成它的单词的特殊构型联系在一起的。在词串片断提供的信息足够时,惯用语的比喻意义才被激活,这个位置就是该惯用语意义激活的键。对于可预测性不同的惯用语,键的位置是不同的。可预测性越高,键的位置越靠前。

Titone 等(1996)的研究结果验证了 Cacciari 的结论,此外还发现,高预测性惯用语的比喻意义

激活的位置从惯用语呈现结束(Cacciari 实验中的 heaven)向左移动到倒数第二个单词(seventh)^[14]。激活位置的提前是因为 Titone 所选择的惯用语都是熟悉度较高的,这说明惯用语的熟悉度是影响其意义激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熟悉度越高,惯用语的比喻意义激活越快。

Titone 在实验中还引入了另一个重要变量,即惯用语的字面意义可能性(literality)。在英语中,有些惯用语只有比喻意义而没有合理的字面意义。例如,shoot the breeze 的比喻意义是“闲聊”,而它的字面意义“射击微风”在语义上不成立。Titone 考察了字面意义可能性与可预测性这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高预测性的惯用语而言,如果该惯用语有合理的字面意义,那么尾词的字面意义被激活并维持下去,如果没有合理的字面意义,则字面意义的激活很快被压抑下去。对低预测性的惯用语而言,无论有无合理的字面意义,尾词的字面意义都被激活并维持下去。更有趣的结果是,高预测性—有合理字面意义的惯用语的比喻意义的激活量从倒数第二个词的位置到惯用语的结束位置(从 seventh 到 heaven)逐渐减少,而高预测性—无合理字面意义的惯用语的比喻意义在两个位置的激活量没有多少变化^[14]。这说明惯用语的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有合理的字面意义,就会压抑比喻意义的激活。

总体来看,目前在惯用语研究这个领域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惯用语与一般词组在句法和语义方面具有很多共性,惯用语不是心理词典里单独的一些僵死的比喻。惯用语与一般词组的认知加工过程之间的差异比以前想象的要小的多,惯用语的加工也包括字面意义的激活和句法分析过程。研究方法有待改进,例如,跨通道启动法多采用词汇判断作业,考察与惯用语比喻意义相关的靶词的意义激活速度。这种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惯用语的比喻意义很难被一个靶词的意义所概括。此外,绝大多数研究选择的惯用语是动宾结构的,虽然英语惯用语中有一半属于这种结构,但是,现有的惯用语理解模型还不能解释其它类型的惯用语。

4 参考文献

- 1 顾蓓晔,缪小春. 汉语习语理解研究. 心理学报,1995;27:15-19
- 2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MA:MIT Press,1965:68
- 3 Nayak NP,Gibbs RW. Conceptual knowledg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diom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1990;119: 15-330
- 4 Gibbs RW. What do idioms really mea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92;31:485-506
- 5 Gibbs RW,O'Brien JE. Idioms and mental imagery:The metaphorical motivation for idiomatic meaning. Cognition,1990;36:35-68
- 6 Nunberg G. The pragmatics of reference.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1978:84-89
- 7 Gibbs RW,Nayak NP. Psycholinguistic studies on the syntactic behavior of idioms. Cognitive Psychology,1989; 21:100-138
- 8 Gibbs RW,Nayak NP,Cutting C. How to kick the bucket and not decompose:Analyzability and idiom processing.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89;28:576-593
- 9 Gibbs RW,Nayak NP. Speaker's assumptions about the lexical flexibility of idioms. Memory and Cognition, 1989;17:58-68
- 10 Bobrow S,Bell S. On catching on to idiomatic expressions. Memory and Cognition,1973;1:343-346
- 11 Swinney DA,Cutler A. The access and processing of idiomatic expression.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79;18:522-534
- 12 Gibbs RW. Spilling the beans on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for idioms in conversation. Memory and Cognition,1980;8:149-156
- 13 Cacciari C,Tabossi P. The comprehension of idiom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88;27:668-683
- 14 Titone DA,Connine CM. Comprehension of idiomatic expression:Effects of predictability and liter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 and Language,1994;20:1126-1138